

專訪台灣國際醫學聯盟

創會理事長鄧昭芳醫師

談◆國◆際◆化

劉明毅

引言

這次成大醫學院與立陶宛柯納斯醫學大學(Kaunas University of Medicine)簽訂合作協約，背後的推手是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創會理事長鄧昭芳醫師與他所帶領的台歐合作團隊，費時超過一年半以上的經營成果。藉著此次合約簽訂，並透過與鄧理事長的交談，成大人將能夠分享他多年來推動國際合作的歷程，對正在努力國際化的成大，也許可做為參考、對照，甚至反思的對象。

從波海三國談起

和波海國家的第一次接觸，是在二〇〇四年四月間，由鄧理事長組團前往我們聽來熟悉卻少有接觸的「波羅的海三小國」：立陶宛、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之後又陸續在今年初與中旬三度造訪。在問到為什麼會對波海三國特別傾心，因為在這之前，鄧理事長的足跡已經遍及西歐、北歐與東歐各國。他表示，與三國的交往過程，和其它歐洲國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波海諸國過去曾數度被鄰國強佔領統治，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才獲得解放，成為獨立民主國家，對強權欺凌的苦痛記憶猶新，對追求自主的渴望依然

強烈，造訪期間所接觸的人、事、物，都一再透露這股鮮明又感人的民族情懷。即便自去年加入歐盟與北約後，俄羅斯對三個國家經濟、社會、政治、外交上的蓄意箝制，使得當地的反俄情緒依然高漲。把波海諸國所經歷的過去與現在，和台灣的處境相比，也許無法等同視之，但在某些情境的感受上，卻有高度相似性。歷史發展的軌跡與實體的國際地緣政治，使得三國和台灣在某種程度上面臨著類似處境，也是我們得以用「同理心」發展深厚友誼的共同基礎，也因此確認接下來的工作重點，會放在加強與該區的交流合作上。

談到台灣和波海三國，鄧理事長提到另一個有趣也值得我們深思的共同點。二〇〇四年令人動容的手牽手護台灣行動，其實並非史上第一次。事實上，在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約二〇〇萬波海三國人民用雙手將三國首都串成長達五九〇公里，約可繞全台灣一周的人鏈，紀念並抗議蘇聯波海三國人民長達半世紀的德俄密約，要求獨立復國。這個事件在當時轟動全世界，三國更於一九九〇—一九九一年，不顧蘇聯大軍壓境，先後宣佈脫離蘇聯獨立，又舉行公民投票，終獲復國。

什麼是國際化？

台灣各界，從政府到民間，小學到大學，都一直把國際化掛在嘴邊。中正機場出入境大廳滿滿的台灣人，有出國參加會議的學者和政府官員，留學遊學的青年學子，加入海外觀光團的阿公阿媽，自助旅行者，還有家庭旅遊組合；再看各大學校園內，公布欄上張貼的大小國際研討會海報一場接一場，更別說街頭巷尾處處可見的雙語幼稚園、補習班；感覺上我們與國際接軌應該做得不錯。郭理事長語重心長地說，「不夠！」

「那裏不夠？」他指出，台灣的學者專業水準不比國外差，可以在學術會議上發表優秀論文，但是在專業領域外，是否有能力和國際友人暢談音樂、美術、哲學、文史、社會現象，甚至台灣的鄉土人文特色，也許都要打個問號。這樣如何與人交流，得到國際友人的認可與尊重？事實上，在臺灣這種人太多了，不但表示我們沒有做到國際化，甚至可以说國際競爭力正在下降當中。不具備人文素養的醫學生，做不成好醫師，同樣地，本土化不夠紮實，國際化又如何提昇？

另一方面，台灣自脫離聯合國後，孤立於世界外卻仍有值得驕傲的發展，建立相對安全自主的社會，不自覺地形塑了台

灣人自卑於被孤立的處境，同時又自大於經濟發展居領先地位的雙重性格。這種特殊情結常顯現在我們面對外界的態度，以及我們自以為是的國際化上。郭理事長舉例，我們對待東南亞人士，就明顯與對待歐美人士的態度不同，即使是歐洲，看待東歐人的眼光與看待西歐人的眼光，也有相當的差異；談到交流，台灣人也多半認為不是別人要來取經，就是我們受邀出國，提供寶貴的經驗分享（當然除了美日與西歐國家之外），很少想到我們需要向他人學習之處還有很多。波海三國同屬歷史悠久，人文素養豐富的歐洲地區，從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際互動的情形，可以發現雖然他們的國民所得少於台灣一半以上，經濟發展不如台灣，但生活品質和自然散發出尊重人的優雅氣質，以及言語交談的深度，是很多台灣人所不及的。一般人出國或在國內碰到外籍人士，總是要肩負全民拼外交的重重大任，悲憤地講述著台灣遭受多大的不平等待遇，同時又帶著難以自拔，我們錢最多的暴發戶心態，好像世界非向我們學習不可。

這次立陶宛柯納斯醫學大學校長 ZALUNAS 教授一行人，除了到台南與成大醫學院簽約外，在台灣停留共近十天，他在某個場合做了一點評論，也讓我們反覆

咀嚼。Z 校長說，「這次來到台灣，我們看到、聽到很多，也學到不少，充分瞭解台灣尋求國際支持的做法，我盼望台灣朋友繼續努力，運用不同的途徑與堅定的決心，早日達到你們想要的目標。」校長口中所謂「不同的途徑」，以及他所認知的「台灣尋求國際支持的做法」，和我們心中所想的是一樣的嗎？在推展台灣國際化的同時，有必要不斷自問，這個途徑是否得到國際伙伴的認同，我們的熱情接待，會如何解讀？是被質疑別有目的？還是被放心的接受？旁人的每一次談話，都會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回應我們的作為。

凡事從紮根做起

郭理事長說，凡事最重要的就是紮根。不論是培養台灣的國際合作人才，或是開拓國外合作夥伴，都要從這點出發。他甚至計畫把紮根的動作擴展到海外台商第二代子女身上，尤其是具有醫學公衛背景年輕人，「把這些人找到，他們的根還在這兒，這是我們突破國際參與瓶頸，在國內國外都可以發揮的生力軍！」

我們的國際化還有一個盲點，很多朋友認識國際上重量級人士，但只停留在一對一交往，若沒有時常聯繫，用心經營，很容易就散了。這個一對一關係沒有深遠

的發展，擴散的效益會十分有限，是很可惜的事。國際化絕對不是一對一、個人的事，而是一種綿密的網狀關係，在這個網絡之中，每個人都雨露均霑，同時受惠並共同提昇。鄧理事長回憶起台北榮總前院長鄭濟勳對他說的話，「多做一點對社會有益的事，於你無害。」趨利避害是人性天生本能，深一層去思考鄭院長的話中涵意，相信大家都能有所體會。

鄧理事長認為協助別人，就是協助自己，還要給別人犯錯及改正的機會。這看起來似乎是淺顯易懂的道理，但要實行起來，卻又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我們常常看到別人的缺點，對其優點卻視而不見。他舉自己的例子，說明為什麼在繁忙的醫院業務外，還有餘力到各國走透透，又能找到適任可靠的團隊共事，原因無他，取其善，避其惡而已。

最後，在問到台灣在未來五年的發展，將如何訂出優先順序時，鄧理事長話鋒一轉，直言未來五年，應致力於改善兩

岸關係，建立互信，在異中求同。他解釋說，兩岸問題沒有時間等到政治局僵局解決後再來談，現在就要開始，尤其是有益於各項防疫與衛生措施的推動，從食品藥物安全、傳染病防治，到緊急應變醫療，才能嘉惠生活上與我們息息相關的華人民生活。

結語

從與鄧理事長一席話，得知他心中的國際化是不分地區遠近、意識型態，不求出鋒頭或上媒體版面，而是多方面的在做紮根工作。所以，不論我們以醫界大老、政治人物、自由主義者、社會運動者，或是人權鬥士，來衡量他的所作所為，都可以發現些許契合與衝突之處。

